



珍藏版

伍

山東畫報出版社

老照片

第二十二辑

老照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胡政之和他的时代 谢泳
认识斯文·赫定 马大正
法国人镜头里的老昆明 黄豆米
王伯南的《江皖灾民图》 张恣宽
林昭之死与我们这代人 范泓
养蜂人 王涵
遥远的乌兰布和 赵振先
台湾的“土改” 徐宗懋
影像中的雨果 殷力欣

0044065

山东画报出版社



收集日军屠杀罪证

1947年1月28日，南京战犯法庭审判长石美瑜（前立者）在组织有关人员收集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罪证。（秦 风）

目 录

谢 泳	胡政之和他的时代	1
-----	----------------	---

提起《大公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张季鸾和王芸生，而胡政之对于《大公报》这样一个“文人论政”平台的搭建亦功不可没。当1949年新时代到来之际，胡政之却悄然逝去，与他的时代一起寿终正寝，幸耶，悲耶？

马大正	认识斯文·赫定	12
-----	---------------	----

嘉 蔚	莫理循和他的中国仆人	22
-----	------------------	----

主与仆本已有一层阶级的隔膜，倘若是洋主中仆，则又多了一层民族的间隙。但例外的情况也每每有之……

张 鸣	洋人“行乐图”	28
-----	---------------	----

黄豆米	法国人镜头里的老昆明	30
-----	------------------	----

张恣宽	王伯南与《江皖灾民图》	41
-----	-------------------	----

皮福生	火烧船厂	47
-----	------------	----

邹启钧	沙市旧影	51
-----	------------	----

丁文令	昆仑关纪事	56
-----	-------------	----

许觉民	祭林昭	58
-----	-----------	----

范 泓	林昭之死与我们这代人	61
-----	------------------	----

任何一个人，虽不能超越所处的时代，却完全可以独立于那个时代……

沈 芸	爷爷的四合院	66
-----	--------------	----

小小的北京四合院为夏衍所钟爱，它目睹了主人的逢遭际遇、荣辱坎坷……

鲜继根	鲜英与“民主之家”	80
-----	-----------------	----

老照片

40年代，堪称是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蜜月”
期，本文记述的是发生在陪都重庆一处大宅中的
故事……

苏晓林	我的父亲苏静将军	94
王 涵	养蜂人	105
张丽华	姥爷无故事	111
张 兵	往事	115
赵振先	遥远的乌兰布和	123

回首往事，每个知青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乌
兰布和”……

徐宗懋	台湾的“土改”	128
	国共两党都曾为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 的理想而努力，途径却迥然有别……	
史耀增	“批林批孔”小景	132

《老照片》丛书

殷力欣	影像中的雨果	135
朱晓枫	又见母亲	152
高增德	吕荧何以罹难	154
刘瑞琳	怀旧 VS 浪漫	158

主 编

刘瑞琳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 涛

封二 收集日军屠杀罪证(秦风) 中插 1948年·
南京(徐宗懋) 封三 北京街头的剃头匠(林心)
民间乐班(严强 50) 街头宣传(黎明 110)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
品，须经本社同意。

名人一瞬

胡政之和他的时代

谢 泳

胡政之和胡适之还真是有一点缘分，胡适之人们很熟悉，而胡政之对许多人来说差不多就是一个陌生人了。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是当年《大公报》的三巨头之一。他比胡适大两岁。祖籍四川成都，但因为父亲在安徽做官，所以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安徽度过的，胡适是安徽人，他们也勉强算是有一点同乡关系。1930年，胡汉民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没指名地批评了胡适，说胡适在《泰晤士报》上写文章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其实是一场误解，胡汉民所提胡适的观点是听说的，胡适根本就没有说过。胡适在这些事上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给胡汉民写信，追问他何时说过那样的话。不久，胡适看到了胡政之的《新都印象记》，就给胡政之写信，问是不是胡汉民当时提到了他的名字，胡适说：“请你看一个被诬蔑的同宗小弟弟的面上，把当日的真象告诉我。”（《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35页），胡政之收到胡适的信后，给胡适写信，说胡汉民“确对弟提及大名。”胡政之虽然没有胡适的名声大，但在他那个时代，因了《大公报》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作为社会贤达他也是非常知名的。他后来是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据胡适在1947年给王世杰的一封信中说，当时酝酿中的无党派人士中，有四个可能成为国府委员，这四个人是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胡政之，可以想见当时胡政之的社会声望。

说胡政之，还要多说几句胡适之。



1941年香港沦陷后，胡政之（左2）率部分同人离港赴桂林途经广东惠阳时的合影。

胡适是《大公报》的热心读者和作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胡适引用和阅读《大公报》的记载。他在办《独立评论》的时候，也常转载《大公报》上的文章。特别是从《大公报》创办了“星期论文”专栏以后，胡适和它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胡适可以说就是这个专栏的主持人，许多稿子都是《大公报》直接和他联系的。

胡适曾说过：“《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1188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大公报》“星期论文”的第一篇，就是胡适写的，题目是《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大公报》是胡适在二三十年代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渠道，那时胡适和他的《独立评论》周围的朋友都先后成了《大公报》的作者和读者。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争论，都与《大公报》有关，胡适一生当中，特别是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特别重视，他们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同上 1446 页）

胡适一生对《大公报》非常有好感。在他生活中，可以随时看到涉及《大公报》的记载。他对胡政之的评价很高：“后来在



1945年6月，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创立大会期间接受采访。

《大公报》
和《国闻周
报》上读了
胡政之先生
的两种《两
粤游记》，
我很感惭
愧。他游两
粤，恰在我
之后，走的
路线也恰和
我走的大致
一样；但他
是一个有训
练的名记

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以供读者参考。”
(同上 1344 页)

胡适说：“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只好把这一个月多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有什么材料和灵感。”(同上 1344 页)

1934年12月30日，胡适说：“这两天在火车上，因为要替《大公报》写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论文’，……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新开始的一年里可以做到什么事？’我是向来说平实话的，所以跑野马的结果也还是‘卑之无甚高论’。”(同上 1320 页)

胡适与《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和王芸生对时局的评价意见相同，特别是对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国共问题，他们的认识大体一致。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地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隐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胡适对于《大公报》的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套,其中寄托着他的理想。胡适一生对言论自由(主要体现为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报》身上,胡适有一种见西方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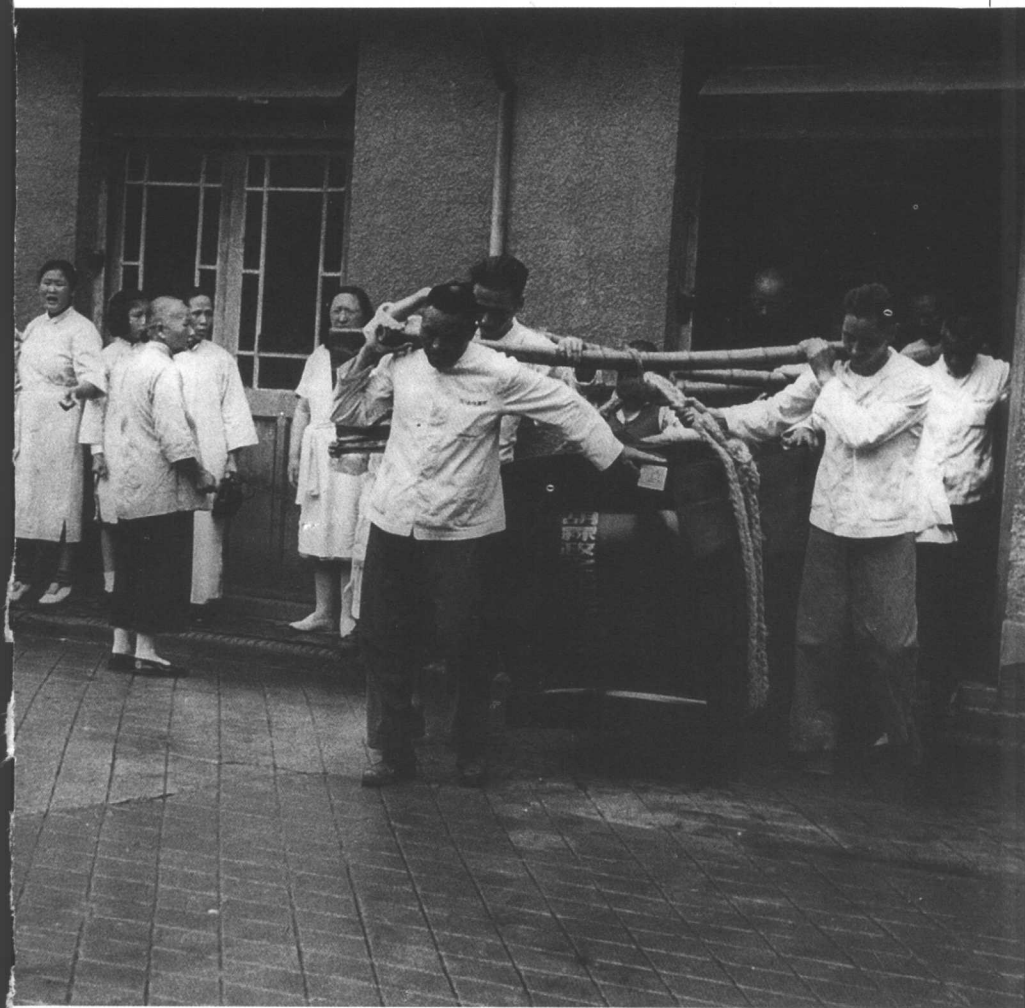
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后的喜悦,《大公报》体现了胡适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和理想。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辞别人世,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比如徐铸成先生,都认为他的结局是悲凉的,因为胡政之去世后,有一些家庭纠纷。不过,对于《大公报》的同人来说,他们却另有感触,胡先生的离去,可能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大公报》已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还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1950年4月,王芸生率《大公报》同人为胡政之扫墓,不过一年时间,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人的眼里已满忧虑了,他们在担心什么?死去的《大公报》时代成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大公报》的阴影已罩在他们心中,他们在给胡政之扫墓,更是在给《大公报》扫墓。

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在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1950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并没有做到,用胡适的话来说,我们总不能拿没有东西的,来打有东西的。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于上海病逝。图为胡政之棺木从停柩处抬出。棺木左侧戴眼镜女士为胡政之夫人顾俊琦。



胡政之棺木入葬之情形。

胡政之去世的时候，当年《大公报》三巨头，张季鸾已在1941年去世，吴鼎昌早已离开了《大公报》，胡政之在当年的三巨头中，是以“经营”著称的，那时人们都说《大公报》是张季鸾的笔，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经营，基本说出了他们三人的长处。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



1950年4月，胡政之逝世一周年，王芸生率《大公报》同人祭扫胡政之墓。

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著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一个时代

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它生存的时代，总还是为它提供了一些制度保障，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胡政之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

胡政之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诟病，一是他为了《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 20 万美元的公价外汇，这被许多人指为是受国民党的津贴；二是在国共和谈将破裂的时候，蒋介石要开“国大”，要制定“宪法”，胡政之作为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李纯青在回忆《大公报》的经历时曾提及此事，他说，胡政之曾对人讲，国大开幕前，蒋介石召见他，当时傅斯年在座，蒋当时很不高兴，傅斯年说：“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胡政之只好去会上签了个名，然后就回了上海，再没有开会。因为当时中共和民盟都决定不参加，所以对于参加了会议の其它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向都很反感。关于此事，40 年代，周恩来在延安还有一个说法：“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11 月 11 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周恩来选集》上卷 260 页）人在历史中总是有

矛盾的，不过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选择，必须要有“了解之同情”。对胡政之来说，他是一个民间报纸的代表，他首要的是对公正的舆论负责，他要保持一个民间报纸的独立性，在一个政治并不十分清明的时代里，他的选择是很为难的，他虽然没有开会，但他选择了参加，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他的选择，可以批评，但有两个事实是我们要尊重的：第一，《大公报》作为民间报纸的合法性，在那个时代里始终是得到承认的，国共两面它都骂过，但也都说过他们的好话，它也受过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苦，但这张报纸还是活下来了；第二，胡政之在 1946 年的选择，不能以对蒋介石的评价为判断依据，因为蒋也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历史人物，是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作结论的，一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能对无党派人士保持相当的尊重，这是一个人的优点还是缺点？是民主风度还是独裁作风？

胡政之还以无党派身分，代表中国参加过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时中共代表是董必武，而力主代表团应有中共代表的，一个是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另一个就是胡政之，他们都提议由董必武来参加，名单公布后，周恩来也认为是公平的。据说胡政之临终前曾对费彝民说过：“董必武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有什么样问题，可以去找他。”不过，胡政之死了以后，谁也救不了《大公报》，因为它的时代结束了。

·名人一瞬·

认识斯文·赫定

马大正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865—1952）

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凡稍有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也许听说过这个名字，早年当我还在上大学时即属此类，只是对斯文·赫定的事迹知之甚少。“文革”中一度逍遥时，偶尔得到一册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开始是随意翻阅，很快便被斯文·赫定的探险经历所吸引，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进入80年代，自己也忝在新疆历史研究者

之列，获得了到新疆考察的实际经历，对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也由稍知到有所知，了解斯文·赫定、认识斯文·赫定的愿望日益强烈，甚至遐想有朝一日到远在天边的瑞典去寻访斯文·赫定生活的足迹。90年代初，我有幸参与组织一项与瑞典学者联合进行的名为“西域考察与研究”的科研项目。为此，1992年5月，我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到了斯文·赫定的故乡、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商谈并落实合作中各项事宜当然是此行主要任务，但同时也圆了多年来我欲寻访斯文·赫定生活足迹的梦。

斯德哥尔摩是斯文·赫定生之地、死之地。斯文·赫定自中亚探险回国受到市民热烈欢迎的斯德哥尔摩大街依然整洁宽敞，斯文·赫定发表演说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会议厅仍然金碧辉煌，只是在壁端挂上了偌大的斯文·赫定油画像，与众多瑞典科学家画像并列。斯文·赫定终生未婚，1952年逝世后，他的遗物按遗嘱全部存放于瑞典民族学博物馆，属于皇家科学院。我们的合作伙伴沃尔特斯特先生既是瑞典民族学博物馆研究人员，又是斯文·赫定基金会负责人之一，在他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收藏于瑞典民族学博物馆的斯文·赫定藏书和遗物。在博物馆库房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排放着斯文·赫定生前的藏书，即便浏览一遍，也非易事；